

水上市场

(新加坡) 尤今

抱着重温旧梦的心情,我于去年重访曼谷的丹能沙朵水上市场。

拥有百余年历史的水上市场,原本是泰国市民生活场景的一部分。泰国中部河流麇集,水上交通异常方便。河道绵密,两边挤挤挨挨地建满鳞次栉比的木屋。为了便于水上人家采购日用品,当地舟贩遂以小舟运载各种农产品、食品 and 商品,与居民进行交易。

初访丹能沙朵水上市场,已是将近40年前的旧事了。

好风如水,头戴斗笠的朴实村妇轻轻地划着小舟,晃荡晃荡的小舟上,丰盛地堆满了五彩的色泽,熟到巅峰的木瓜、甜入心坎的黄梨、皮质光灿的香蕉、清凉诱人的椰子、香到极致的榴莲,全都精神抖擞;热带水果若有若无的香气,就像薄雾的雾,轻轻地笼罩着热闹的河道。有些舟贩,兜售手工艺品,木刻品、铜雕品、棉织品、丝绸、皮包、披巾……应有尽有,尽显泰国风情。舟贩不强制销售,一切你情我愿。想要吃了、想要买了,一声呼唤、一个手势,载人的小舟、载物的小舟,便像是缘份初绽的两个人,缓缓靠近、靠拢;买卖双方,都笑意浮荡。我的身份,不是锱铢必较的游客,而是不小心掉落于当地场景的一个小市民,在亲切的寒暄过后,以一种君子的方式完成交易;然后,在粼粼的波光里,挽着满怀欢愉回去,心情闲适自在。

有人把曼谷的水上市场称为“东方威尼斯”,然而,我始终认为,华丽的威尼斯是属于浮躁的游客的。但是,丹能沙朵水上市场呢,却是属于当地人的,那种生生不息的活力,更能触动人心,也更贴近人心。

流逝的岁月始终不曾偷走这份鲜丽的记忆。

然而,没有想到,今年,意兴勃勃地重访这个我曾一度钟情的水上市场时,感觉却猝然死亡,而且,死得十分彻底。

那个早上,依旧是好风如水,阳光兴高采烈。在曼谷中心搭乘公共汽车颠簸将近两个小时,来到了一直美美地锁在我心房里的丹能沙朵水上市场。

一下车,便大大地愣住了。

河面上,宛如过江之鲫,全是坐满游客、堆满商品的小舟。不计其数的小舟,就在河上毫不浪漫地肌肤相亲。许多虎视眈眈的舟贩,把小舟停泊在靠近岸边之处,守株待兔。载着游客的小舟靠近了,舟贩便伸出一支带钩的长杆,不由分说地把游客的小舟勾过去,游客在这种强行的“勾引”下,被围观看舟贩所展示的商品。舟贩漫天开价,实价可能是原价的四五倍。有人看中了一面鼓,卖方开价2000铢,买方还价1000铢,卖方立刻首肯;这时,有人提醒买客,这面鼓最多只值400铢。买客再度还价,卖者不依。买客嘱船夫离开,不意舟贩却用长杆把小舟硬生生地勾回来,叫骂、斥骂,粗暴的语言“咚咚咚咚”地跌进河里,使原本污浊的河水更加污秽了。买客只好自认倒霉,花钱消灾。

就在这喧嚷嚷嚷、纷纷扰扰的一刻里,我清清楚楚地听到了心房传来了“咔嚓”一声,那是记忆碎裂的声音。

水上市场,原本是属于当地市民的,可是,现在,却变成了一个充满旅游动力的地方;那种满溢商业气息而近乎铜臭的动力,夺走了原有的朴实魅力。

记忆里鲜活的情感被谋杀的那种感觉,竟是如此不堪。

坐在装饰得花团锦簇的小舟里,我意兴阑珊。真不该再来的。唉!



前些日子,人民日报文艺部老主任、诗人袁鹰九十寿辰,文艺部老同事多有登门祝贺。袁老师自是前辈,而现在报社院内人士称呼我,也每每在姓氏前加一“老”字了。于是也充一个老资格,登门拜寿。

袁老师此前不慎摔跤,不良于行,端坐客厅,气色还是好的。他和老同事交谈,有一个特别关心之处,就是人民日报文艺部的部史,说因其与共和国建国时代文艺息息相关,要年轻同事赶紧收集史料,整理出一个“史”来。祝寿归来细细思量,

突然有所感悟,那就是人民日报文艺部的创始人都是诗人,诗歌情结将他们聚拢到一起,先有《人民日报》“人民园地”文艺副刊,在副刊基础上成立文艺组。

时在1949年1月31日,范长江率领人民日报先遣队进入北平王府井大街,接收国民党《华北日报》,于2月2日创办《人民日报·北平版》。

范长江是报业大家,即在编辑部内设4个组:城市、时事,还有副刊和艺术组。这是人民日报由农村编辑部时期的内勤、外



夜来香是家乡对紫茉莉的叫法,实则与真正的夜来香相去甚远。虽明知是个美丽的误称,然这名字里有一份情意在,故就此错下去也无妨。也许是因它夜开昼合,又散发着清淡香甜气的缘故,所以才在家乡落得“夜来香”这花名吧。在从前,平常百姓家的女孩儿用的化妆品可都是大自然的馈赠,比如《花镜》里还提到夜来香能

晚饭花夜来香

贺学宁 文/图

当作口红来点唇,这个算是第一次听说,故从未做过尝试。小时候倒是喜欢把它的种子从花蕊里倒着拉出挂在耳朵上当耳环戴。它的种子小小的,圆而黑硬,有次听本地人说到在广东它被叫做地雷花,感觉很有意思。至于晚饭花这个名号则是从书里看来的。

汪曾祺说小时候吃完晚饭后,常常到长了一丛——他们那里叫晚饭花——的废园里去捉蜻蜓:“我在别的花木枝头捉,也在晚饭花上捉。因此我的眼睛里每天都有晚饭花。看到晚饭花,我就觉得一天的酷暑过去了,凉意暗暗地从草丛里生了出来,身上的痱子也不痒了,很舒服;有时也会想到又过了一天,小小年纪,也感到一点惆怅,很淡很淡的惆怅。”他后来还因此写了一篇小说,就叫《晚饭花》。“晚饭花开得很旺盛,它们使劲地往外开,发疯一样,喊叫着,把自己开在傍晚的空气里。浓绿的,多得不得了绿叶子;殷红的,胭脂一样的,多得不得了的红花;非常热闹,但又很凄清。没有一点声音。”这是《晚饭花》里写晚饭花的一段文字,读来似乎被一股强大又哑然的力量所吞没着,又有一种平章花木、月旦盐柴的琐细里时间流逝的怅惘。



诗缘

钱江

勤两大部制度向城市编辑部转化,首次设置副刊组。

首任副刊组组长即是“园地”主编李亚群,时年43岁,1931年入党。他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青年时代起就是活跃诗人。

他长期从事地下工作,曾任四川泸县中心县委书记,川东特委宣传部长,南方局直轄桂林统战工委书记,后来到重庆《新华日报》任副刊组长。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封了《新华日报》,报社成员撤回延安,周恩来亲自到机场迎接。李亚群转入中共中央城工部,中央机关撤出延安后他前往山西临县中央后委驻地。

范长江在重庆就知道李亚群,《人民日报·北平版》创刊次日即将李亚群调来编辑副刊。李亚群的级别很高,进城后在北京饭店遇到周恩来。周说你还在人民日报吗?如果离开了会不会影响工作?

李亚群笑答:“偌大的北京城还找不到一个编报屁股的?”周恩来闻言亦大

笑。1950年5月,李亚群南下任西省委宣传部长。

就在李亚群编辑副刊时,时任冀鲁豫边区文联主席的诗人王亚平接调令进京,也担任人民日报副刊组长。可见当时实行的是双组长制。

王亚平时年44岁,抗战初参加革命,几次去延安未成,因此他是1946年在南京由周恩来批准入党的。他早在中学时期即开始诗歌创作,成名甚早。解放战争开始后他进入鲁南解放区。

他于1949年3月到北京与李亚群会合。一个月后,李亚群就调走了。

当年7月,在北平召开全国文艺界代表大会,以诗名“马凡陀”著称,也是老资格地下党员的袁水拍到北平参会,会场上和邓拓相遇。邓将升格为中央机关报的《人民日报》总编辑,因李亚群南下,文艺组长出缺,他盛情邀请袁水拍北上,接替李亚群。

袁水拍是在上海成长的诗人,早年在中国银行工作,抗战爆发后参加救亡活动,后撤到香港,太平

洋战争爆发后进入中共领导的东江根据地,再辗转桂林,于1942年经夏衍介绍入党。

抗战胜利后,袁水拍随中国银行回到上海,业余时间作为《新民报》编辑副刊“夜光杯”。这段时间,他以“马凡陀”笔名发表的诗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因此上海解放后他作为诗人参加文代会。

李亚群、王亚平、袁水拍三个诗人主持了创建时期的人民日报文艺部。与之相应的,是《人民日报》副刊刊登了大量诗歌。那是一个诗的年代,《人民日报》上刊登的诗歌对当时诗坛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有意思的是,两年后,人民日报从上海解放日报调来诗人袁鹰,担任文艺部副主任。不久前,年轻新闻史学者白贞淑写出博士论文《人民日报文艺副刊与中国新诗》。如此开题,就在于她发现人民日报文艺部创始人都是诗人。

确实,那是一个诗的时代,而今天看来已经是另一番样子了。文艺部老主任袁鹰的感慨,当是有感而发。



歌对当时诗坛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有意思的是,两年后,人民日报从上海解放日报调来诗人袁鹰,担任文艺部副主任。不久前,年轻新闻史学者白贞淑写出博士论文《人民日报文艺副刊与中国新诗》。如此开题,就在于她发现人民日报文艺部创始人都是诗人。

确实,那是一个诗的时代,而今天看来已经是另一番样子了。文艺部老主任袁鹰的感慨,当是有感而发。

树上的“牵牛”

安武林

第一次在灵隐寺的大树上,看到了这些可爱的小东西。

我很惊讶,它们是小小的牵牛么?它们攀援在大树上,和牵牛的藤和叶子一模一样。只是,它们比牵牛玲珑得多,比牵牛娇嫩得多。

我绕着树转来转去,就是找不到它的根。我只能看见它努力生长的样子,却看不见它生于何处。

后来,当我看到一些百科类的读物时,才知道它们是附生植物。

它们一片一片,像是在装饰这些高大粗壮的树木,把叶子贴在树上。

它们像是大树的小朋友,借了一片生长的空间,攀附着枝干,依偎着它,汲取着雨露、水汽默默地生长。

也许,这些附生的植物,便是对朋友这个名词最恰当的诠释吧——深情凝视,孤独陪伴。

“长乐”是我小小书房墙上唯一的一幅墨宝。它潦草怪异,苍劲洒脱,气势恢宏。乍一看,犹如腾空而起的大鹏鸟追逐搏击长空的雄鹰。怪不得初入书房的朋友难识庐山真面目,一经点穿又啧啧称赞。因为它虽怪僻无比,却不失汉字的规范。

“长乐”的作者是旅美书法家曹彭年先生,启功先生赞誉其为“现代怪书”。

曹先生落笔前,问我写点什么。我说“知足常乐”,他不表态。接着我连说了带有“乐”字的“助人为乐”、“自得其乐”、“老有所乐”……“老朋友,恕我自作主张啦”,说时迟,那时快,“长乐”二字已跃然纸上。

我多少次在墨宝之前反复沉思,觉得它的境界非同凡响,比之我列举的“乐”字远远胜出一筹。不是吗?试想,个人图个一时快乐又何难,难的是天天快乐。那么,人世间有没有长乐呢?孔子是肯定的,他说:“君子,其未得也则有所乐,既以得之,则乐所事皆治。是以有终身之乐,无一日之忧。”

为了寻求长久的快乐,我告别寂寞的书房,走进陌生又热闹的茶室。那里有五湖四海的朋友,有千奇百怪的信息,有令人捧腹的笑话。可是喧嚣嘈杂,烟雾弥漫,二手烟熏得我透不过气来。怪谁呢?人家是营利场所,“春风不度玉门关”,《控烟条例》要在茶馆实施是难上加难的。

二手烟把我逼回久违的书房。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一比,真有失而复得的欣喜。其实书房真好。它清静幽雅,内涵丰富,无论大小总是读书人的天地。钱钟书先生深明寂寞之道,几十年闭门读书,潜心写作,连慕名而来的外国人也婉拒不见。当然,这样的大学者我是无法相比的。但他耐得寂寞,甘于淡泊的精神值得学习。重回书房的第一感觉,读书不寂寞。可以向远古的圣贤求教,可以同帝王将相攀谈,可以向中外文豪学习,可以同众多的哲学家议论,是莫大的精神享受。书中不时闪现的火花与亮点,往往逼着我提笔写点文字,这叫有感而发。文章写得好不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享受写作过程的快乐,同时刺激大脑神经,预防或延缓老年痴呆症发生。

老虎也要打盹。读、写也会疲劳。我就遵循“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古训,每天行进在小区、公园、田野,至少一小时,风雨无阻。读、写、走,我自鸣得意地封它为快乐“三字诀”,像我这等无班可上的退休族,如有兴趣,是可以做到的,如有恒心,是能够坚持的。说不定这就是我要寻觅的长乐之道。



上海歌剧院和上海大剧院常会被不知情的人混淆。不时有外国艺术家跑到上海大剧院打电话找我,我哭笑不得的同时都会自豪地跟他们说,虽然办公地点不同,但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因为歌剧院和大剧院同属于上海大剧院艺术中心。

在上海大剧院的舞台上,我曾经成功扮演了被誉为世界歌剧男高音第一难的角色“奥赛罗”,当时的情形至今历历在目。有了那次“奥赛罗”的成功演绎,才有2007年上海歌剧院带着歌剧《奥赛罗》赴芬兰塞翁林纳歌剧节演出,“当今世界上最优秀的奥赛罗之一”也才会成为我的一个代名词,更使2013年国家大剧院新制作歌剧《奥赛罗》时第一个想到邀请我。

时隔近10年,年近花甲,我还在继续挑战自我,不敢懈怠。这一切,若

没有上海大剧院艺术中心这个平台,没有中心下属的院团和剧场的紧密合作,恐很难实现,或需要更多的时间才得以完成。

40余年的艺术生涯有许多瞬间令人难忘,而其中绝大部分又都与上海大剧院艺术中心分不开,有赖于中心的支持。2013年7月到8月间,我率上海歌剧院随市委宣传部、大剧院艺术中心组织的“海上风韵——上海文化全国行”赴老家东北巡演,在沈阳、大连、营口、丹东、长春、大庆、哈尔滨7个城市连办5场歌剧《卡门》和9场音乐会。多年在外奔波演出,能有机会回到东北,并参与了全部9场音乐会,那种荣归故里的

兴奋实在难以言表。能将上海的优秀舞台作品带到东北,心中也感慨万千,万分自豪,感觉对家乡人民有个交代。上海大剧院艺术中心帮助我实现了多年的夙愿。

同年12月,我在上海大剧院举办的从艺40周年音乐会也是由中心主办的,获得很大成功。能在这么特别

的日子里举办音乐会,向我的第二故乡——上海的人民汇报,意义非凡。从2005年中心成立,一晃十年过去了,院团间的合作正在逐步深化,逐渐融为一体,而我的身份也从当初的副院长,到院长,再到如今的艺术总监。除了用最擅长、也是最喜爱的方式继续不倦地为人们歌唱,面对歌剧院演出

“我们就是一家人!”

魏松

和剧目的推进,我也担负着义不容辞的责任,培养年轻的后备力量更是当务之急。值得肯定的是,上海大剧院艺术中心在青年人才的培养上做了大量工作,发挥着很大的作用。像韩蓬这样的青年歌唱家在中心的支持下逐渐羽翼丰满,在大剧院的舞台上崭露头角。我相信还会有更多的优秀青年艺术人才能在大剧院艺术中心的扶持下,带着音乐梦想不断前行。我也盼望着有一天,上海大剧院艺术中心能集整体优势,策划举办每一届的歌剧节,推出我们自己的歌剧品牌,那将是一大幸事,一大喜事。

十日谈

大剧院艺术中心和上芭智慧之处是给予了大剧院“制造”编舞家足够的空间。